

往事如昨

大二哥二三事

徐源和

大二哥是大伯家的二儿子,比我年长26岁。从我刚记事起,就对这位身着军装、英俊潇洒的二哥有一种崇拜和亲切感,我叫他大二哥,一叫就叫了50多年。

被子送老乡 狗肉治胃病

大伯共有7个儿子,有4个儿子分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八路军和解放军。大哥和四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,大哥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,当时已是营长。

大二哥叫徐源璞,1942年他18岁,在鬼子“大扫荡”期间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,担任过区小队长。1944年在昆崙县公安局参加工作,后调到胶东区公安局。

1946年端午节前两天,大二哥接到紧急任务,由他担任组长,组成5人保卫组,护送中原解放区的新四军首长到东北地区工作。当时国民党的军舰封锁了渤海海峡,于是他们一行人换上便衣扮作商人,在蓬莱莱家口码头登上了一艘小汽船。一路上,遇到两批、6艘军舰的多次盘查,首长和保卫组的同志们沉着冷静、机智应对,有惊无险地抵达了庄河县。

就在他们一行的汽船快到目的地的时候,一位首长高兴地吟道:“大洋一叶舟,船小有来头。巧设空城计,司马被骗走。”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大二哥,也在他心里播下了文化的情愫。

后来,保卫组的5人就留在东北,成了这些首长的警卫员。从此,大二哥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行列。

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波澜壮阔,每一位东北野战军战士都有着出生入死的经历。大二哥从来不说自己的“过五关斩六将”,说的最多的是对牺牲战友的怀念。他不止一次地说:“罪让他们遭了,命他们丢了,福却是我们替他们享了。”

记得他给我说过两件事,一件是到了东北以后,条件非常艰苦,宿营经常都在百姓家。一次他跟房东

攀谈,得知对方是山东老乡,立马倍觉亲切。住了几天,看到老乡家没有一床像样的铺盖,大二哥临走时送给老乡一床他配发的被子,老乡说什么也不要。大二哥说:“部队经常轻装,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丢了,咱是老乡,你真不用客气。”老乡反复地感谢。此后大二哥好长时间就同战友合盖一床被子,但是他觉得心里暖暖的。

还有一件是当时东北战场军事形势很紧张,部队经常转移,饭也吃不好,大二哥经常胃疼。一次突然紧急转移,饭在锅里半生不熟,大家捞起什么拿着就走。轮到他时,锅里有一块半生不熟的狗肉,他捞起来一边走一边吃。说来也怪,打那以后,他的胃再也没疼。于是,他到处告诉人家他有“偏方”:半生不熟狗肉治胃病,几乎传为笑谈。

“虽挨大板四十,意志坚定不移”

后来,由于大二哥工作积极、聪明好学,组织上安排他到上海学习,他成了一名年轻的海军干部。

新中国成立了,大二哥正值大好年华,长得英俊还是军官,给他介绍对象的人络绎不绝。抗美援朝打响后,大哥牺牲在朝鲜战场,大二哥坚决不找对象,他说,大哥牺牲了,我要帮着大嫂拉巴两个孩子。再说正在抗美援朝,我随时可能上战场,战场上子弹不长眼,我不能耽误人家。就这样,他一直做着上前线的准备。直到朝鲜战争结束,大二哥才和家乡邻村的小学老师结成伴侣。

大二哥在部队当兵,二嫂在家乡教学,大二哥每次回乡探亲都到我家住一晚两晚,再转车回家。他和我父亲至契要好,什么事两人都商量,经常拉到半夜。

大二哥非常爱学习,除了看书以外,还坚持练毛笔字,吃完晚饭,在我家的小炕桌上磨好墨,一笔一划写满一大张报纸,这是他一天的任务。我看到他临的帖是《欧阳询九成宫》和《柳公权玄秘塔》。

记得是195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,大二哥突然来到我家,脏兮兮的老头衫,海军蓝裤子裤脚挽到腿肚子,脚穿橡胶水鞋,一看就是从地里直接来的。

他和父亲坐着小板凳在院子里说话。原来当地出现旱情,部队组织工作队帮助抗旱。大二哥到了田间地头就向老乡请教,老乡说:按古语说,照现在的天气症候,近几天有一场大雨,现在得赶快组织锄地,把土松开,下雨就能渗得透。现在千万不能浇水,太阳一晒土地板结,雨水渗不下,水都流走了。还说,锄地也能保墒,如果不下雨再浇地也不迟。大二哥向上级领导反映后,接到的指示是抗旱救灾、挑水浇地。大二哥管的这片地依然抓紧锄地,就这样他被撤离了工作队。他满心地休探亲假了,路过我家。父亲劝他说:“公道自在人心,总会有个是非曲直,受点委屈不怕,对得起良心就好。”大二哥慢慢平复了心情说:“我想通了,想想牺牲了的战友,这不算什么事。”后来没过几天,果真下了一场透雨,锄了的那片地吃透了水,庄稼长势良好,

而浇了水的地都“涂了”。后来,大二哥写诗明志:“贞心为真理,誓把意见提。为国为民计,生死何所惧。”

大二哥在工作中总是实事求是,坚持自己的观点,绝不随波逐流。有一次,他在烟台看完周信芳演的京剧电影《四进士》,看到宋士杰伸张正义的情节,回来后感慨地写了首诗,我记得有两句是“虽挨大板四十,意志坚定不移”,这就是他的人生态度和心声。

1964年,大二哥从部队转业,在当地的发电厂任书记。刚刚工作一年多,就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二嫂担心大二哥,就把不满10岁的两个女儿留在老家让亲戚照看,她带着3岁的儿子到发电厂来陪着大二哥。有一天,早上大二哥穿着整洁的衣服上班,晚上回来就浑身贴满大字报。二嫂就给他往下撕,一边撕一边哭。大二哥就幽默地说:“不用撕了,留着盖在身上省了盖被了。”二嫂说:“都这么样了,你还开玩笑。”大二哥一边挨斗,一边用心工作,保持电厂的正常运转。他一直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地在发电厂工作到离休。

老有所乐 诗以言志

往事,情感厚重,深沉感人。

大伯家解放前生活很苦,大二哥回忆时写道:“儿时家太贫,无钱去上学。本是孩童期,随父去干活。秋收交完租,口粮太有限。老少想活命,野菜渡时艰。为了补家用,农闲做零工。常常背星走,报晓鸡未鸣。饿了吃地瓜,冻硬啃不动。看见小吃店,兜里没有钱。忍饥含泪走,眼黑金花窜。因为走得急,脚掌泡成串。呲牙又咧嘴,忙完回家转。忙了一整天,挣不几个钱。到家夜已静,只闻狗叫声。喜见八路军,参军闹革命。跟着共产党,穷人有救星。”他回忆参加革命的经历写道:“回忆一九四二年,抗日形势大好转。我军越战越强大,胜

利消息频频传。日本鬼子急了眼,想把败局来扭转。来势汹汹大扫荡,胶东大地起狼烟。敌人疯狂野兽样,奸淫烧杀极凶残。猪叫狗咬鸡不宁,夜里火光照亮天。我军指挥赛神仙,神出鬼没巧周旋。我军展开反击战,到处歼敌拔据点。鬼子尾巴长不了,不到三年完了蛋。当时我当青抗先,年仅十八正青年。于今变成白头翁,算算整整六十年。”回忆起在东北战场的艰苦岁月,他乐观诙谐地写道:“解放初战敌军狂,频战睡觉穿衣裳。全身成了虱子堆,扫衣鸡吃虱子忙。”

大二哥离开已20年了,但他的人品容貌,常留在我心中,他的“兵体”诗歌仍在亲友中广为流传。

老家翻出的老照片

沐溪

我和老公回老家收拾老房子,在柜子里翻出了一本老相册。老公拿出来随手翻开,看到了他小时候的全家福。

这是一张四寸大小黑白色的全家福,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末。那个年代,照相馆只有一寸、二寸、四寸和六寸。照片底色有一种古朴的气息,人物表情都拘谨、严肃。老公有些激动,用手指着父母中间的小孩子对我说:“你看,这个是我,两边是爸爸妈妈,左右两侧分别是大姐和二姐,后排站着的是大哥和二哥。”老公说,那时候他也就五六岁,记得是赶马车的大舅把全家人拉到莱阳的。

我从老公手里接过相册,一页一页轻轻翻看着,一张四寸大小两个人的全身照映入我的眼帘。仔细一看,是公公和婆婆年轻时的合影。只见婆婆梳着一对油光发亮的大辫子,亲昵地依偎在公公的旁边,英俊高大的公公面带微笑,站在婆婆的身后。我脑海里开始了各种美好的想象,在那个年代,这样无缝隙亲昵地站在一起的照片很是稀有。

老相册里有一张是婆婆抱着一个五岁大小的男孩,那是老公的哥哥,五岁那年得了大脑炎,没有抢救过来。后来,婆婆曾含着眼泪和我说过此事,她内心的痛苦和惋惜,我都忍不住流泪。

听老公说,公公很早就在莱阳“三八”照相馆工作(即后来的光明照相馆)。我老公是1978年接替公公的班进了照相馆。公公的工龄是26年,这样算来,他应该是1953年到莱阳。

当时莱阳有两家照相馆,一家是东方红照相馆,我记得门楼很大气,有两层,二楼是照相室。我八九岁的时候,母亲领着我在这里拍过照片。它的位置就在现在莱阳市政府南边;另外一家就是“三八”照相馆。这两个照相馆公公都待过。公公在世的时候,每年春节回家,都愿意和我说说他在莱阳照相的一些往事。

他说,当时东方红照相馆里有一对大狮子,是他用水泥做出模型,然后再描摹、上色做成的。他说,这对大狮子做得很逼真,摆在那里,惹得很多人前去观看。

公公在上海照相馆学到的技术都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出来,他带了很多徒弟,我老公是他最后一个徒弟。

说到照相,过去只有城里才有照相馆。拍照片也是一件很隆重很奢侈的事情。那时候,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,除非是结婚之类的人生大事,否则,难得照一次相。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,有走街串巷的照相人来到乡下,富裕的人家会照一张合影,把照片装在相框里,挂在堂屋正墙上。

我仔细端详着那一幅幅透着斑斑时光的老照片,内心有一种亲切感。每一张都在记录着一个家庭的故事,传递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信息;那一幅幅呈现着黑白格调独特神韵的老照片,会让一种厚重、质朴的沧桑感,从历史的长廊里扑面而来。

如今,摄影设备日新月异,一部手机就可以随时把瞬间定格,但对于我,仍喜欢老照片那种独特的韵味。那种特有的纸张、用闸刀闸出的锯齿以及它特有的光泽,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